

# 全本周易

中  
华  
古  
书

證陰陽變化之大道  
衍古今未來之否泰



卷  
四

中华古书

李志敏 主编

全本周易

卷四

中国言实出版社

唐代的杜审言，字必简，是杜甫的祖父。唐中宗时做修文馆学士，为人恃才自傲，曾对人说：“我的文章那么好，应该让屈原、宋玉来做我的衙役，我的字足以让王羲之北面朝拜。”杜审言有些太自不量力了，所以被后世的人们所嘲笑。这样骄傲自夸只能是显出了他的见识的短浅，并没有人认为他的才能真的有那么大。骄矜不忍只能是貽笑大方。

《劝忍百箴》中对于骄矜这个问题这样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魏侯受田子方之教，不敢以富贵而自多，盖恶终之衅，兆于骄夸；死亡之期，定于骄奢。先哲之言，如不听何！昔贾思伯倾身礼士，客怪其谦。答以四字，骄至便衰。斯言有味，噫，可不忍欤！”

这段话意思是说，金玉满堂，没有人能够把守住。富贵而骄奢，便会自食其果。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魏文侯接受了田方子的教诲，不敢以富贵自高自大。骄傲自夸，是出现恶果的先兆，而过于骄奢注定要灭亡。人们如果不听先哲的话，后果将会怎样呢？贾思伯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客人不理解其谦虚的原因。思伯回答四个字骄至便衰，这句话让人回味无穷，咳，怎么能不忍耐呢？

确实是这样。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骄矜之气盛行。千罪百恶都产生于骄傲自大。骄横自大的人，不肯屈就于人，不能忍让于他人。做领导的过于骄横，则不可能很好地指挥下属，做下属的过于骄傲则会不服从领导。做儿子的过于骄矜，眼里就没有父母，自然不会孝顺。

骄矜的对立面是谦恭、礼让。要忍耐骄矜之态，必须是不居功自傲，自我约束，克制骄傲的产生。常常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学习。

要克服骄傲自大，培养谦恭礼让的品质方面，古人为我们做出了不少榜样。

据《战国策》记载：魏文侯太子击在路上碰到了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击下车跪拜，子方不还礼。击大怒说：“真不知道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无礼，还是贫贱者可以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可以傲慢，富贵者怎敢对人骄傲无礼？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只有贫贱者计谋不被别人使用，行为不合于当权者的意思，不就是穿起鞋子就走吗？到哪里不是贫贱？难道他还会怕贫贱？会怕失去什么吗？”太子见了魏文侯，就把遇到田子方的事说了，魏文侯感叹道：“没有用田子方，我怎能听到贤人的言论？”

富贵者、当权者自身本来就容易有骄傲之势，看不起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但是作为统治者，如果不能礼贤下士，虚心受教，他就可能因为自己的骄矜之气而失政权，富贵者则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财势。

相同的例子还有《左传》中记载的在成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鲁国和卫国忧虑齐国会来攻打他们，都到晋国去搬兵要讨伐齐国。晋国派郤克率领中军，士燮为上军之将的辅佐，乐书带领下军，去救鲁国和卫国，在华泉打败了齐军，俘获了齐国的车右逢丑父。齐国用甗和玉贿赂晋国，并答应把侵占鲁国和卫国的土地还给他们，以此作为求和的条件。于是晋国部队班师回朝。晋景公慰劳将士们说：“都是你们的功劳。”郤克回答说：“这是你教导有方，更全凭将士们的努力，我又有什么功劳呢？”士燮回答说：“是荀庚指挥得好，是郤克控制全军，我又有什么功劳？”作为臣子的，如果都能如此谦虚，不居功自傲，那该多好，后人听了，都将称赞他们贤明。三位将军能够获胜而归，最重要的怕是他们谦恭相让，精减团结的结果。

还有西汉人龚遂，字少卿，是山阳南平人，因为明经及第做了官。龚遂为人忠厚刚烈，有节操。昭帝时做渤海太守，在任多年。皇上派使者召他回去，龚遂手下的议曹王生



愿意一起去。而功曹认为王生向来爱喝酒，而且喝起来没有节制，不同意他一个人去。龚遂不忍心拒绝王生，就让他跟着到京城去。到了京师王生每天只喝酒，不理睬龚遂。有一天碰上龚遂被召进宫的时候，王生在后面追着喊道：“太守先停一下，我有话对你说。”龚遂返回来，问他有什么话说。王生说：“皇上如果问你是怎样治理渤海的，你不能摆自己的功，回答时应该说是圣上的功德，并不是小臣的功劳。”龚遂接受了他的意见。到营中之后，皇上果然问他治郡的情况，龚遂照王生说的那样回答了皇上的提问。皇上十分赏识龚遂的谦和作风，并笑着说：“你从哪儿听到的长者之言？”龚遂于是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话，这是我的议曹王生教给我说的。”皇上认为龚遂年老了，拜他为水衡都尉。

东汉刘昆，字桓公，是陈留人，梁孝王的后代。小时候学习礼仪，学习施氏的《易》。光武帝时，先做江陵令。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刘昆就向火叩头行礼，火就灭了。后来他做弘农太守时，老虎都背着小老虎渡河跑了。光武帝听说此事觉得很惊奇，提拔他做了光禄勋。光武帝问刘昆：“你以前在江陵的时候，使风熄火灭；后来做弘农太守，老虎北渡逃走，你推行什么德政，而达到这样的结果？”刘昆回答说：“这不过是偶然碰上罢了。”皇帝身边的人都答他老实愚讷不会自夸，而光武帝感叹道：“这才是长者的话呀！”回头叫人记在史册上，用来警醒世人。

如果一个人喜欢自夸自大，就算是有了一些美德，有了一些功劳和成绩，也会丧掉。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看不起他人的工作，就会失去自己的功劳。北魏贾思伯，是益都人武帝时做任成王澄手下的军司。到肃宗和明宗时，又让思伯做侍讲，也就是老师。皇帝也跟思伯学《春秋》。贾思伯地位虽然很尊贵，但对下人很平易，对贤人很尊重。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做到不骄傲？”贾思伯说：“骄傲必然伴随衰败，天下哪有富贵恒定不变的道理？”当时人认为这是很高明的见解。

固执自己的见解的人，会不明白事理；自以为是的人，不会通达情理；自傲者，不会获得成功；自夸的人，他所得的一切都不会保持长久。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骄矜不忍危害很大。作为统治者骄傲自大，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则会失去人才，失去人心，最后也必然要失去江山。作为统帅如果产生骄傲情绪，则骄兵必败。即使普通人，自以为是也会众叛亲离，难以成事。只有谦虚、听劝、忍耐骄矜之情的增长，谦和对人，才能无往而不胜。谦受益骄致败，可谓千古一理。

## 郭子仪严己宽人得人心

中唐之际的郭子仪功高名著，多次被谗失权，仍以“祸难未平”而“不遑寢息”，不仅后来的皇帝尊他为“尚父”，隔代的史家也都盛赞他的业迹，称赞道：

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榛。六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讎，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武举出身。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



兵反唐后，玄宗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治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诏其率朔方健儿东讨。从此，郭子仪与唐王室的命运便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受命之后，郭子仪率部长途跋涉，先后击败安禄山在今内蒙、山西北部的驻军，打通战略要地东陉关（在今山西代县东）。紧接着，分朔为健儿万人，出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定河北。第二年夏，郭子仪与李光弼联军，大败史思明于嘉山（在今河北正定县东）。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安禄山守将而归降，从而切断了在洛阳的安禄山与其根据地范阳（治在今北京）之间的通道。

郭子仪等在河北苦战赢得的这一局面，更加重了玄宗轻敌的心理，急于要收复东部洛阳。郭子仪闻知玄宗委用哥舒翰率兵出潼关攻洛阳，立即指出：“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师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玄宗不听，结果兵败，朝廷西逃。肃宗至朔方即帝位，郭子仪与李光弼率步骑五万自河北急赴灵武。原本“兵众寡弱，军容缺然”的肃宗的宿卫禁军，由于郭子仪等的到来，“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朝廷自此，也“唯倚朔方军为根本”，数月之间，郭子仪率部平定河套，攻破漳关，致使“潼、陕之间无复寇抄”。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统十五万兵众进攻长安，与安庆绪守将安守忠大战于长安西香积寺北。“自午至酉”，奋战四个时辰，安军大败，京城长安光复。十月，又与安庆绪守将严庄等激战于陕州（今河南陕县）。“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贼分兵三千人，绝我归路，众心大摇，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十余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师遍山泽。”王师入东都洛阳。

随后，河东、河西、河南失陷各郡亦皆平定。及郭子仪入朝，肃宗遣兵仗戎容迎于灊桥，并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仪再度出征，擒安守忠以献，进位中书令。九月，奉诏大举，与李光弼等九节度之师讨伐安庆绪，因朝廷不立元帅，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宣慰使，郭子仪连破叛军，收复卫州，围安庆绪于邺县。但王师虽众，由于“军无统帅，进退无所承廩，自冬徂春，竟未破贼”。后史思明率范阳精锐再度南下，王师溃败，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桥，退保东都，使唐王室免于再遭播迁之难！

观军使鱼朝恩素来忌妒郭子仪多次建功，便借九节度之师大败，推卸责任，向肃宗进谗。郭子仪被召回京，“虽失兵柄，乃心系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寢息。”不久，史思明又攻占河南，复陷东都洛阳。党项诸羌，亦趁机欲“吞噬边鄙”，乾元三年（760）正月，肃宗用郭子仪为宁、坊两镇节度使，假其威名以镇渭北。宦官李辅国欲固己宠，暗示肃宗“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离间肃宗与郭子仪。由于当时不少人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肃宗又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率兵上万自朔方直取河阳。但诏下十多日，被鱼朝恩从中作便，“事竟不行”。

上元二年（761）二月，河阳失守，鱼朝恩退保陕州。三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既而，太原节度亦被部下所杀。当此“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之际，肃宗“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出镇绛州（治在今山西新绛）。此时，值肃宗病危，引子仪入卧内，嘱托道：“河中之事，一以委卿。”郭子仪至绛州后，河东诸镇“率皆奉法”朝廷。

不久，肃宗驾崩，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同事，“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郭子仪又被留在京师。其后，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代宗欲以郭子仪副之，程元振、鱼朝恩再次作梗。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寇，边将告急，程元振不报，直到吐蕃攻陷泾州，长驱深入，骚扰京畿，满朝上下计无所出之际，才“遽诏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郭子仪自留京师，部曲离散，及至奉诏，部下仅二十骑。赶赴咸阳时，吐蕃二十万众已过渭水。郭子仪立即遣使入奏，请增防卫。但程元振竟不召见，致使吐蕃渡

过渭水便桥，直逼长安。代宗出逃，京城再度陷落。郭子仪收整六军溃逃将士，暗接内应，不日收复长安，代宗以其为西京留守。程元振以郭子仪再度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郭子仪上书，请车驾回京。代宗后悔地对郭子仪说：“朕不早用卿，故及于此。”

永泰元年(765)九月，回纥、吐蕃分数道逼近京畿。长安震恐，人情危迫，代宗下诏亲征，急召郭子仪自河中至，屯兵泾阳。郭子仪军万余人，杂于敌围数重之间。年近七旬的老将，自率甲骑两丁出没于敌阵。回纥知是“郭令公”，欲与相见，诸将以“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郭子仪说：“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说罢，免胄释甲投枪而进敌营，指责回纥负约，吐蕃无道，并许以重叙旧好，酹酒盟誓。于是朔方兵马与回纥部众联合，吐蕃连夜奔退。郭子仪挥军追击，大败吐蕃。代宗诏罢亲征，京城解严。后郭子仪被派往泾阳(今陕西泾阳)，长期驻守，以备吐蕃。

大历二年(761)底，郭子仪父坟被盗。“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子。子仪心知其故，乃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可是，郭子仪入见代宗，竟是一番自责：“臣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在此后的岁月中，吐蕃骚扰越来越频繁。郭子仪及其所部兵马，总是出没在征战的第一线，成为李唐皇室所倚重的“根本”。大历九年，郭子仪又入朝专论备吐蕃策：“愿陛下更询览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同时，自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以使“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为“长久之策”。此时，郭子仪已经六十八岁了。

郭子仪握兵权二十多年，为振兴唐室东征而讨，可谓“至勤”。程元振、鱼朝恩等肆意毁而无怨，朝廷遇有危难，闻声即出，力挽狂澜，堪称历代重臣的楷模。

在唐代中期著名将领当中，声誉最隆者也许莫过于郭子仪。其实，就平定安史之乱的武功而论，郭子仪似乎尚不及当时与他齐名的李光弼。然而，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要超过李光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恐怕是郭子仪一生行为更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应具备的优良品质。即所谓“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讎，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正是基于这个因素，旧史家才百般歌颂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郭子仪这种封建将帅的优良品德，反映在他的治军活动中，便是能够真正做到严己宽人，与李光弼相比，郭子仪在治军上是“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即对待部下宽厚仁爱，使得将士们感恩图报，乐于效命。史称其“事上诚谨，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一说法并非虚言，当然郭子仪对部属也并不是一味宽容，他在治军上也有“赏罚必信”的一面，说他“临下宽厚”只不过是比李光弼相对而言罢了。

至于郭子仪本人严于律己的表现，新旧《唐书》本传乃有更为详实的记载。他忠心耿耿为维护大唐一统江山而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他从不拥兵自重，矜伐己功。对朝廷的诏命他百折不扣地加以执行，而未尝讲究什么条件。即便是遭到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流的中伤毁谤，郭子仪也不改变初衷，依旧以国事为重，尽忠尽责。正因如此，“谗谤不能行”，小人的陷害终于未能得逞。

郭子仪严己宽人的品德，使得满朝官员及普通百姓深深景仰，甚至连那些奸佞小人，骄横藩镇也不得不表示佩服。如田承嗣盘踞魏州时“傲报不轨”，可是当郭子仪派人出使魏博时，田承嗣却当着来使的面，面向西边望空而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来使说道：“兹

· 周 ·

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郭子仪)拜。”又如李灵曜在汴州独霸一方，不论公私财物，只要途经汴州，都一概予以截留。唯独郭子仪的钱财粮饷从汴州通过时，不但不加扣留，而且还“令持兵卫送”。至于郭子仪麾下的宿将，不管其身为“王侯贵重”，在他面前更是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听凭郭子仪“颐指进退，如奴仆焉”。

古人说：“仁以附众，敬以招贤。”郭子仪严己宽人的品德修养恰好在这个问题上为后人树立了楷模，更深为曾国藩所推崇。

## 作恶太多，必受惩罚

古代实行“人治”，“人存政在，人去政亡”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人跌蹶，后人拾级”，都是讲事业有传人。但在古代却很少有人做到。相反，有的权臣总不想放弃权力，虽“势不使尽”，但因作恶太多，而受到惩罚。

明代后期的权相严嵩父子就是这样。严嵩二十余年受到嘉靖帝的宠信，然而，严嵩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精力大不如前，世宗虽特许乘舆入值，但行走不便，须人搀扶。“黄阁此身长扈圣，赤松何计许归田”，“北山梦薛虚相忆，犹是公家夙夜身”，他为此写了不少欲谢职归乡的诗作给世宗看，但世宗不许他又不敢力请。也好，趁此机会可以做几件善事，以赎前罪：他一反常态，忘记了往日的恩恩怨怨，开始提拔受贬的俊杰之士，唐顺之、赵贞吉皆已释归，并登显要，士大夫有人谒者，必一一劝慰，“务得其欢心”，“因而有称之者”。

他还置酒设宴，邀请次辅徐阶。酒酣人泣，严阁老涕泪交流，随后，让家人围跪在徐阶前后，举起颤抖的酒杯，声音哽咽着说：“嵩旦夕且死，此曹唯公乳哺之。”徐阶连谢“不敢！不敢！”，用心何其良苦。史书中说严嵩致仕前几年，“知天下人怨之间，舍旧郗而收录知名士”，是赎罪？还是为子孙计？权力可以把人异化为神，使人蜕变为禽兽而毫无人格；一旦远离它的时候，方复归自然，还其人之本性。

嘉靖四十年(1517)闰五月，严嵩的结发之妻欧阳氏病故，世宗从其请，令严嵩之孙严鹄代理丧事，留严世蕃侍其父。严世蕃“颇通国典，晓畅时务”，以才自负，曾说天才人才只有他、陆炳、杨博三人。严嵩年迈后，诸司奏事，则说：“以质东楼”。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世宗所卜手诏，多属片言支语，严嵩读之再三，仍不解其意，只有严世蕃一目了然，所答皆为世宗称许。欧阳氏死后，世蕃虽留京邸，但因母丧不能入西苑值所，代替父亲票拟。严嵩只得数次派人请世蕃代答手诏，但都因其耽于女乐而不能按时回答。太监督促急时，严嵩只能自答，世宗多不满意。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甚雕琢，世宗大为不满。

嘉靖四十一年(1518)，世宗密封自己的疑问，令其宠幸的方士蓝道行以乩作答。道行拆开密封，见世宗提的问题是：“今天下何以不治？”于是假托乩语，回答说：“贤不竟用，肖不退耳。”世宗又问：“谁为贤、不肖？”答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又问：“吾亦知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答说：“上真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世宗对方士的扶乩术极为相信，蓝道行的

· 易 ·

五五三



答语无异于严嵩的一道催命符。随后，徐阶又将这件事透露给御史邹应龙，邹应龙知嵩必败，立即上疏劾严嵩父子乱政贪贿罪状，并说：“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

世宗下诏，令严嵩致仕，逮捕世蕃，同时特有严鸿为民。后来有人揭发了蓝道行拆密封等事，世宗大怒，以为自己又为别人所欺，立即将道行打入大牢。一时中外疑惧，皆言严嵩将复用。嘉靖四十二年(1519)七月底，严嵩在南昌别墅，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严嵩又取其符箓，以及自己撰写的祈鹤文章，一并呈上，作为世宗万寿节的贺礼，世宗下诏大为称喜。严嵩得寸进尺，请赦世蕃等罪，世宗不许。世蕃不思收敛，没抵戍所雷州，中途返回江西，并大造田宅。罗龙文到浔州戍所后，也立即逃到徽州，又几次往来江西、安徽间，与严世蕃计事。

嘉靖四十三年(1520)冬，南京御史林润巡视江防，查知世蕃不法事，立即上疏说：“臣巡视上江，备防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摇撼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4000余人。道路汹惧，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世宗得奏大怒，令林润将世蕃、龙文捕送京师，以谋叛罪处斩。世蕃身材矮小，肥白如瓠，而无脖颈，江湖相面士说他是猪形，法当受屠。世蕃死后，严家被查抄家产，得黄金3万余两，白银200余万两，各种珍宝、衣饰品、工艺品价值几百万，及南昌、北京等十余处房产。当时人认为这个数目只是严嵩实有资产的十分之几，其余大部分早已分藏各处，于是又严加搜补，致使江西百姓，皆受其累。这时的严家已无片瓦，严嵩只好请人在祖宗的墓地旁搭个草棚，寄食度日。嘉靖四十五年(1522)底，一代首辅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享年八十七岁。临终前，他艰难坐起，写下了生平最后一行文字：“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报国是否“惟忠赤”，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

严嵩罢后，徐阶代之为首辅，三年后世宗寿终正寝。

可见凡事总有消长的道理。

## 青词宰相，贪婪聚财

青年才俊颇负盛名，怎奈仕途险恶。退隐山林走终南捷径，终于大器晚成。几经周折，方始登阁拜相……严嵩，权术的代名词。一个富可敌国的奸相，最终落得乞讨为生，一个白发皓首的垂垂老者，曳竿乡野之间，最终冻馁而亡。

### □ 登第与退隐

严嵩(1480-1567年)，明朝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另字介溪，号勉庵。此人身材欣长，眉眼灵活，声音洪亮。

严嵩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通览史卷。求学时期，这位聪颖的少年即在家乡一带颇负才名。科举进仕，为国尽忠，在封建教育思想的熏陶下，严嵩也立下了这样的人生志向。在他读过的书中，社会政治是一幅富有诱惑的画卷，虽然有时沉重，有时艰涩，但英明的圣主和敢谏的诤臣勾勒了历史的主体进程，那些奸臣佞士，最终都得到了应

有的惩罚。严嵩在这种教育下，自然产生了为人臣者应学魏征，应学岳飞的思想。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1505年(弘治十八年)春，满腹经纶经典的严嵩过五关、斩六将，进士及第，旋改庶吉士。根据明初刘基建议确定的科举办法，进士要经过三考。上年行省考试得中称为举人，本年的全国会考则属于再选拔，考上者分为三甲。考上这三甲者有权进入“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根据阅卷官的基础意见，再重新调配三甲。一甲之人称进士及第，直接“升官”，送进翰林院，分别授予修撰和编修；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称等进士出身。二、三甲中可选择几名、十几名文章书法突出的留在翰林院深造，称为“庶吉士”。三年学成，优者即留翰林院做编修检讨。别小看翰林院，明朝定制，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是内阁大学士的候补分子，明朝170多名大学士十分之九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取得庶吉士的资格，就等于取得了进入除皇帝以外的最高领导层——内阁的“许可证”或“入场券”，取得了竞争资格。严嵩兴奋异常。凭着一手书法和清秀的长相(明朝大臣需五官端正)，待得数年，华盖殿(首辅处理公务的地方)虽不能一蹴而就，东阁大学士(群辅)还是有望的。关键问题在于自己如何凭着才学和见地与别人竞争了。

然而，凭才学、见地竞争的想法令他败得一塌糊涂。初出茅庐的严嵩还麻醉在封建理学的桎梏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地主阶级每况愈下的时代，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是必然现象，谁不“武装到牙齿”，残酷地撕咬他人，防备被人撕咬，谁就无以自保。“圣主明君、忠臣孝子”的教导无非是达官贵人愚弄人的幌子。

经过一番韬光养晦，一位恬淡功名，潜心诗书经史的清流形象终于树立起来。不过要是以为严嵩真的是淡泊功名，鄙弃官爵的名士，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不过是捞取资本、等待时机而已。他把对富贵的热衷掩盖在用“恬淡自恃”编织而成的外衣内。当名望已成，社会地位巩固以后，便于正德十四年初回京复职。严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山，除了他对富贵的渴望之外，客观环境对他也有利。这时他声望日高，蜚声海内；朝廷不断下诏催促，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是严嵩会议时的考官，基宏、杨一清、毛纪等朝廷大官也是正直之士，杨廷和与严嵩有座师之情；费与严有桑梓之谊，所以严嵩就选择此时出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已经适应了政治权变，变色龙外衣已经织成。古代历来有“归隐以钓誉”的说法，归隐养名，不失为一条当官的终南捷径。虽然严嵩与以前的名士隐居不同，他已有了一定的官职，有了进士出身的显名，但是他这一段隐居钤山的生活，为他日后以柔佞取宠皇帝，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严嵩，这个明代最大的奸臣，从此迈出了阴谋家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此时，他已40岁。

## □ 左右逢源 初展宦术

严嵩初还朝时，并不得志。他被派往旧都南京，先在翰林院任侍讲、后在国子监任祭酒。无论是侍讲还是祭酒，均为学官，品秩不高：前者正六品、后者从四品。但是此时明廷开始了“大礼议”，这“大礼议”于严嵩而言，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结束了他荒淫的一生。皇帝位由湖北安陆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承，这就是嘉靖皇帝。新皇帝即位，给严嵩的仕途带来了光明，而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大礼议”中，严嵩见风使舵，赞成皇帝的观点，引起皇帝的重视并给予提升，由此逐渐得宠，入阁首辅。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的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

为旁支，分封为王。但是正德皇帝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所以只有选血统较近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熹。藩王入继帝位，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是仅仅继承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作生身父母之子，还是过继给正德皇帝、皇后？又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嘉靖皇帝亲自发动并参与了这场“大礼之义”，争议持续20年之久。“大礼议”成了皇帝杨威专权的工具，也成了朝臣相互倾轧的借口。

问题摆上桌面以后，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派大臣坚持“为人后者为之子”，认为世宗既已承了大统，就不应再有私心去顾念私情；主张尊孝宗为“皇考”（“考”在此意同“父”）、尊兴献王为“皇叔考”。以观政进士张燧为首的一派“小”臣却认为世宗是以兴献王世子的身份继武帝皇帝统、而不是继任孝宗后嗣，因此主张世宗应考兴献王而不应考武宗，否则就是人为地使兴献王本来有儿子却变成了没儿子、世宗本来有生父却变成了没生父。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史称这一场争议为“大礼议”。

虽然世宗对杨廷和的建议不满而对张燧的说法很赞许，但杨廷和等人固持己见、并拉出慈寿皇太后张氏做招牌，只同意世宗称其父母为兴献帝、后。世宗不甘示弱，也托皇太后之名在帝、后之前加“皇”字。杨廷和对此耿耿于怀，正巧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世宗完成郊祀仪式后清宁宫后殿起火，杨廷和趁机说这是因为世宗强尊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惹恼了神灵。被迫去掉“皇”字。“大礼议”的这一阶段，杨廷和一派明显占了上风。但杨廷和屡持己见，还打击异己，提拔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引起世宗强烈的不满，他不得不乞休而去、最终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罢去不久，张燧伙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人又旧话重提，建议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尽管杨廷和旧部激烈反对，世宗还是采纳了张燧等人的提议，于嘉靖三年（1524年）称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后”，不久又去掉“本生”二字，引起轩然大波：一百多名朝官闻讯后在左顺门外静“跪”示威，要求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两次降旨劝退，大臣们无动于衷。世宗发了脾气，就命锦衣卫将为首的大臣捕入诏狱，想给群臣一点颜色看看。不料群臣不仅不退，还一起大哭，哭得惊天动地。世宗这回下了狠心，遂命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然后将参与这次“示威”活动的四品以上官员扣俸禄、五品以上官员打板子，同时大张旗鼓地迎兴献王灵位于京、奉于“观德殿”、尊称“皇考恭穆献皇帝”。

“大礼议”虽然有人情的因素在其中，但它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是以世宗为首的新势力和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势力的一次较量。双方都打出“礼”、“孝”的旗号，其实各怀鬼胎：杨廷和是武宗临终的顾命大臣、维系孝宗、武宗的系统才能显示他的“顾命”作用；世宗则想借此机会抑制当时身居要职、手握重权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同时也想选拔一批同自己一条心的新“干部”。较量的结果，世宗取胜。

“大礼议”中拥护世宗的人多是中下级官吏，他们希望能借此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很多人也的确达到了目的，严嵩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严嵩在重返仕途到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入阁时的20多年里，虽然政象纷乱，但他却官运亨通，直线上升，与其他朝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严嵩阴险狡诈、精于权术、善于应变的结果。严嵩揣度时局，认为“礼议”表面上是纯粹的君、父伦理问题，实质上是先朝官僚与新进小臣之间的权力争斗，作为皇族家世枝节，无须凑热闹，与嘉靖皇帝犯难。“大礼议”最激烈时期，严嵩正好在南京做官，而且长达8年之久，这就远离了斗争的漩涡中心。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严嵩忽然鸿运临头——他竟然有机会以礼部右侍



## · 周 ·

郎的身份奉世宗之命到安陆去祭祀兴献王的陵寝！他欣喜若狂，知道跳龙门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取悦皇上的好办法。

严嵩极其认真、虔诚地完成祭祀任务之后，马上给世宗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地汇报了祭祀的全过程。在这份报告中，严嵩写下了对他一生而言至关重要的话：

“臣下完全按照陛下的意思举行祭祀恭穆献皇帝时，天气非常的合乎人意，需要下雨时就下雨、需要晴时就晴了。并且在祭祀前后，石产枣阳，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这一种神秘而又吉祥的现象，分明是上天对陛下偏爱之情的流露，请求陛下令大学士们撰写文章记载这些瑞兆，然后刊之于石，以示天下。”

一番胡言乱语，却直说到世宗心窝里去。世宗一声令下，严嵩立刻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秩序阶正二品——这才只是他得宠的开始。

“近水楼台先得月”，严嵩饱读诗书，焉能不懂这个道理。虽然他已是二品大官，可是远离皇上，总是不利“进取”。故而他又开始打调往北京的主意。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以给皇上拜寿为由抵达京师，这一来他可就不大想走了。等了些日子果然又等来些机会：当时朝廷正想集中人力重修《宋史》，而严嵩工于古诗古文的名声早已扬至京师，所以大学士们就请求皇上留下严嵩帮忙。刚好过了不久礼部尚书夏言又入内阁，礼部尚书空缺，严嵩遂得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正式留任北京。

到了嘉靖十七年，“大礼议”余波又起。嘉靖皇帝欲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享先帝太庙，于是他下诏礼部集议。这时严嵩正是礼部尚书，不得已参与了议论。这是一个相当难于应付的事情，顺从皇帝吧，会招致众怒，被弹劾下台；抗旨不遵吧，失宠罢官的厄运会降临。严嵩小心谨慎地研究着对策，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妙策。他先呈上一份名为《明查秋享大礼议》的模棱两可的奏疏，认为明查配祭，或由皇帝生父配，或由祖宗之功德者配，都由皇帝裁决，至于称宗入庙，不妄加非议。他自认为这样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之意，可以迎合皇帝，不料皇帝对其圆滑的骑墙态度很是不满，令礼部再召集朝廷大臣讨论。皇帝又亲自撰写《明堂或问》一文，要求大臣们迎合附会。侍郎唐胄抗旨力争，被逮捕入狱，削职为民。严嵩吓破了胆，便见风使舵，连忙改变态度，迎合嘉靖皇帝，再上《奉旨议以献皇帝配帝复议》疏，嘉靖皇帝看了很高兴。接着严嵩连日反复思考，计划着如何进一步讨好皇帝，他又呈上《献皇帝称宗大礼议》、《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祫庙文皇帝称祖议》等奉疏，表达自己的忠心。在这些奏疏中，他先是痛骂自己愚昧浅陋，发表了一些不合皇帝心意的意见，接着便对皇上稽古定制的功业以及必须称宗入庙的圣谕大加吹捧，说这是“举百王之旷礼，垂亿代之鸿名”，他还肉麻地把嘉靖皇帝父子比作周文王、周武王，这就把嘉靖皇帝父子奉到了开国之君的地位，使明太祖、太宗也为之失色。他的奏疏还论述了兴献皇帝称宗入庙的合理性，最后提出了具体方案：兴献皇帝与孝宗皇帝是同父兄弟，同为一世，因此，称宗之后，宜尊奉其神主位柎入孝宗之庙，与孝宗同居昭位，而序居穆位的武宗之上。

严嵩令人作呕的阿谀奏疏，使得嘉靖皇帝无比高兴，下令完全照严嵩说的去办理，称宗柎庙于是成定局。至此，持续了17年之久的“大礼议”达到顶点，而严嵩是这场压轴戏的前台主演。举行典礼时，严嵩受皇帝命令担任知大礼上册使，连日召对于玄极殿、桂一堂、文华西室，皇帝以“宗伯”（就是礼部尚书）相称，而不呼其名。严嵩为了充分演好这场戏，又别有用心地编造了一篇天人感应的神话。据说，在举行明堂大祭仪式的前三天中午，在太阳周围出现五色云气，按照迷信说法，这是吉祥的征兆。严嵩为讨好皇帝，特地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赋，对皇上议礼的协德再次肉麻地歌颂一番，他搜肠刮肚，最大

## · 易 ·

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水平和媚上的技巧,从而为大祭之礼制造了热烈而神秘的气氛。嘉靖皇帝本来对祥瑞之贺有特殊爱好,就下令把严嵩的颂词收藏于史馆,并且誉录赏玩。严嵩在这场议礼之争中,博得了嘉靖皇帝的欢心,被赐予白银 100 两,彩帛 400 段,钞钱 4000 贯,另加授太子少保,升一品官阶。促成“称宗入庙”,在严嵩的仕途中却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成为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现在严嵩已经不可动摇地取得了嘉靖皇帝的宠爱,为以后步入内阁,独掌大权打好了基础。这时严嵩已是近 60 岁的人,而且在完成后,严嵩又故作神秘,向皇上报告说行礼的时候他看见天上有祥云片片,这必是上天对皇上的褒奖,并建议群臣因此恭贺皇上。群臣本来莫明其妙,但凡人多有虚荣和虚伪本性,大臣们也就推顺水之舟,假装也看见了“祥云”一起恭贺皇上。随后严嵩又施展看家本领,挥毫泼墨,写了洋洋洒洒的《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纪念世宗的“功德”。世宗看后倍感欣慰,还命将两文交付史馆刊印发行。

严嵩接连做的这几件事情都甚称皇上心意,所以不久就被加官太子太保(从一品),连皇上巡幸外地时都得以跟随左右,而得到的赏赐也与“辅臣”同等级别了。

### □ 登阁拜相 位极人臣

要想进入内阁,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严嵩仔细地研究着他的竞争对手,研究着主宰他政治命运的主子:皇帝。新继位的嘉靖皇帝看起来并不是好惹的,颇具主见。嘉靖继承帝位那天,礼部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但他本不是正德帝亲生,便坚决反对,按照自己的意见在奉天殿宣布即位。随后,痛快干净地突然逮捕杀掉了不可一世的钱宁和江彬。这年,嘉靖帝不过 16 岁,对于奸臣就有如此果决的处理,虽出于人指点,亦可见其过人之处。即位当年,他不顾朝廷官员反对,尊生身父母朱祐杭和蒋氏为兴献帝、兴献后,继而又更定生母蒋氏尊号为“圣母奉圣皇太后”。为了镇压众臣的反对,迫使大学士杨廷和辞职,逮捕了 134 名朝臣,廷杖 180 多人,打死 17 人。最后,祐杭神主进了北京观德殿,当上了“皇考恭穆献皇帝”,并特建了“献皇帝庙”。这年,嘉靖年仅 20 岁,但已足以和老辣残酷的任何帝君相比。不过知道了这些,严嵩反而十分高兴。他知道,有主见、爱面子的皇帝并不可怕,因为,柔能克刚,正好可以施展自己惯用的伎俩去应付,绝不发生正面的冲突,利用皇帝吃软不吃硬的脾气出奇制胜,而且还可以借此除掉对手。

世宗表示对严嵩的喜爱时就赏赐给他与辅臣相当的东西,可见世宗的心中,辅臣是何等的重要。其实所谓辅臣,就是内阁大臣。

明初太祖朱元璋因嫌丞相之权太重,所以在惩处结党营私、专权跋扈的丞相胡惟庸之后即罢设丞相而分其权于户、吏、礼、工、刑、兵六部。但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应有专职的辅政大臣,于是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当时殿阁有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各殿阁大学士官秩不过五品,且有明文规定不准他们参予国政。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命近幸之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从此阁臣的设置成为常例。这些阁臣们的办公室在皇宫内的文渊阁,每日前往办公,连饭都由宫中供应;他们常侍天子殿阁之下,“为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当时阁臣最大的权力所在就是“票拟”,即草拟对臣僚各种奏章的处理及皇帝诏书,握有此权,就等于掌握了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明朝中叶起,阁臣中资格最老、最受皇帝宠信的大学士称为首辅或元辅,其余人等称为群辅。

世宗上台后,先赶走了老首辅杨廷和,之后将大礼议中支持自己的张懋等人先后委以首辅之任并扩大了内阁的票拟之权。内阁权重,故而入阁成为严嵩短期的奋斗目标;

· 周 ·

他的敲门砖仍是“媚上”。

嘉靖帝有一个特殊的弱点：爱方术，崇道教。他少年即位，政事、女色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只缘多病，故求长生”，嘉靖帝一边服长生药，一边斋醮祈祷鬼神赐寿，于是方士道士常出入帝王宫殿，宫内也设牌立位，到处道气仙风。嘉靖三年，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还被征入京城，尊为“致一真人”，建真人府，赐彩蟒衣服，以备斋醮祈祷之时随请随到。

嘉靖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修仙皇帝，他的修仙活动影响了整个嘉靖一朝政治，决定了众多朝臣的荣辱沉浮，严嵩的命运自然也与此息息相关。对于世宗嘉靖皇帝热衷道教，鼓吹道教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寄托他的强烈追求：幻想长生，妄图永享皇帝的尊荣。他自幼体弱，加之荒淫无度，以致年纪不大，发须已多半变白，精神不振，死亡的恐怖笼罩着他，他自然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仙的保佑，他迷信神仙，企求益寿延年。二是想借助神权来树立皇帝的权威。他以藩王子弟入继帝统，总是有着一种难以排除的自卑感和威胁感。为了巩固皇位，强化皇权，他一方面要通过“大礼仪”在宗法制度上为自己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同时又通过推崇道教神化自己的皇权。对于臣民来说，“君权神授”的说教有时甚至比暴力更具有威慑力量。由于皇帝推崇道教，道士因此受到特殊的礼遇。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需要献给天神奏章表文，一般用骈丽体写成，用红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又叫“绿章”。嘉靖中期以后，内阁宰相、翰林词臣、朝廷九卿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管理军国政务，而是为皇帝撰写玄文。先后有大臣 90 多人写过青词，侍奉嘉靖皇帝。

严嵩既然已经认定逢迎皇帝，撰写青词自然是十分热心的。青词、贺表、仙丹，是严嵩藉以升官的又一阶梯，也是他打击政敌所凭借的有力工具，他就是登着这一阶梯由礼部进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有名的“青词宰相”的。严嵩还是在作礼部尚书时，就受到恩宠，在便殿受皇帝召对，在西苑侍奉皇帝。嘉靖十八年以前，皇上常住在西苑，从侍诸臣在这里没有固定住处，随召而来。当时严嵩寓居城西四里，就是骑马应召也不方便，为了能够经常接近皇帝，讨好皇帝，他特地在靠近西苑无逸殿的西长安街营建宅第，以便随时召对。后来皇帝命令把西苑无逸展在右厢房改成“直庐”，赐给侍奉大臣居住。从此严嵩日夜守候“直庐”，没有回家休息一次。作为青词专家，他所写的青词令朝廷其他大臣相形见绌。其实，严嵩精心炮制的那些迎神送仙的杰作，只不过是些怪诞迷信之语，奸佞谄谀之词而已。但是他的青词却受皇帝的喜爱，因而不断得到赏赐、升官。

除了写作青词，严嵩还另辟蹊径，他为秉一真人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府第，讨得了秉一真人的欢心。那秉一真人一高兴，就免不了到皇上面前美言严嵩几句。那秉一真人是何等人物！他在世宗的心目中简直就是神仙的化身，连他都说严嵩的好话，世宗又怎能不对严嵩更加恩宠有加！

眼看事态按计划进展，严嵩入阁有望，但是内阁首辅突然出手阻拦。

夏言是严嵩的同乡，正德十二年（1517年）中的进士。虽然夏言中进士比严嵩晚了十二年，但因一直在朝做官，且“性警敏、好属文”深得世宗喜欢，所以官职一直在严嵩之上。严嵩心里很不服气，可是表面上却对夏言极为恭敬，言必称其为“先进”。夏言自视甚高，根本就看不起严嵩，同时见他善于讨好皇上，爬的又那么快，就对他有了戒备之心。夏言本来在内阁之中说一不二，其他阁臣都对他唯唯诺诺，他才不想让严嵩这个危险分子呆在自己身边，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严嵩揣知了“乡党”的心意，行事就更加小心谨慎。一天他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亲自

· 易 ·

五五九



跑到夏言家想请他吃饭,谁知夏言听到仆人通报之后,不仅不答应赴宴,甚至连严嵩的面都不肯见。严嵩恨得咬牙切齿,看起来却大大咧咧、毫不在意,还跑回家把酒菜送到夏言府上一字排开,然后跪坐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等夏言入席。从此夏言虽然更加蔑视严嵩,但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小人真的很敬畏自己。于是就对严嵩掉以轻心。轻敌往往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夏言虽以警敏著称,却未能识破严嵩的诡计——严嵩如此下贱的目的,正是要让对手更加看不起自己、更不屑留意自己;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攻其不备。

要想打击别人,最直接的办法是破坏皇帝对对手的信任。诬蔑、谗毁、谣言中伤、挑拨离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然而夏言是一个真正棘手的对头:正德十二年中进士,“性警敏,善属文”,军国大事,都有主见,极富韬略,并且“善窥帝旨,有所附会”。没入阁即获得一枚“学博才优”的银章。这是一种特权,得赐银章的大臣无论官职多低,用此印鉴,奏章就能及时原封交皇帝本人,叫做“密封言事”。他又是替皇帝撰“青词”的第一好手。入阁14个月即拜首辅赐的官衔是:少师少傅、太子太保、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华盖殿大学士。明朝开国170年未有加号“上柱国”的,可见嘉靖帝对他的信赖。翟銮比夏言早入阁9年,当时身为首辅,对夏言都“恂怕若属吏,备位而已”,如今夏言已成首辅,谁还能“太岁头上动土”呢?严嵩明白,决战前夕,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严嵩一方面使尽浑身解数讨皇上喜欢,另一方面睁大眼睛寻找嘉靖与夏言的矛盾,时刻准备对夏言动手。

夏言没有听到霍霍的磨刀声,依然我行我素。有一年,夏言陪同皇帝谒祖陵回到沙河,半夜夏言的小厨房失火烧掉了皇帝的6封亲笔信。夏言没有单独上书请罪,嘉靖帝训斥道:“打算掩饰罪责吗?”事后,夏言竟若无其事。嘉靖帝母亲死后,以孝道自诩的皇帝十分伤感,决定亲自回承天视察寝陵,由严嵩和夏言护驾。路上行宫失火,烧死不少宫女太监,皇上也受了惊吓。悲哀加上惊吓,头一年因父亲称宗入庙气恼致病,今又反复,身体和精神都每况愈下。3月下旬到了承天,谒显陵,痛哭之后,身体更觉不支,几乎卧床。但严嵩仍然进言,建议在承天举行接等朝臣的仪式,说“今谒显陵祭享皇天上帝大礼成功,朝臣皆欲表贺”。他了解嘉靖注重舆论,从不放过张扬自己的机会,因此借群臣之口谄媚,并建议在承天——嘉靖帝的家乡举行。嘉靖当然很高兴。可是夏言却不赞成,他认为皇帝圣体不宜连襄大举,况且承天无大殿。皇帝不高兴了。因为他最恨别人说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怎能长生?夏言不管他高兴不高兴,又补充两条理由:“千里驰表,劳动天下”,“还要准备大行皇太后葬礼,诸臣不暇奔走”,这无异是指斥皇帝兴师动众,得不偿失,不顾皇太后葬礼大事,反而去搞“表贺”。嘉靖明知自己理亏,但这样被卷面子也实在难以下台。严嵩见机,立即恭谨地说:“臣仍以为承天龙飞殿规划宏大,皇上身心俱旺,贺典立即举行为宜。取决圣裁”。这句把夏言所犯之忌点明了,嘉靖冷冷地决定:“古来礼乐自天子出,礼部赶紧策划奏来。”夏言受了这一遭挫折,灰鼻子灰脸的出了行宫。一周后表贺礼如期举行,听着如珠如泉的阿谀之词,看着文武百官的朝贺,嘉靖神采飞扬,严嵩也欣喜若狂。

表贺庆典完毕,皇帝返京途中驻輿大峪山,58岁夏言的经过几十天的折磨已是疲惫不堪,值班到位晚了。偏偏皇帝要看前天“免湖广灾区税粮诏”的草旨。夏言气喘吁吁跪下时,姿势不对,诏书的稿子也没誊清。嘉靖帝旧恨加新恨,直气得倒仰:“你从卑官提拔起来,不到两年,就怠慢不恭。进密疏不用朕赏赐的银章,那么,你就把朕屡次所降手敕连同银章都交回来罢。”夏言连连叩头称罪,请求免追手敕及银章“留给子孙做一份荣

耀”，皇帝仍然怒气难解。退了朝，夏言只好去请严嵩帮忙求情，这可真是求到了点子上：严嵩找他的毛病还没机会呢！严嵩急忙答应，可是到北京后，却对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皇上，不要追还银章和手敕吧。银章还好说，手敕时间一长，夏言太忙，怕是收藏不周呢！”这哪里是圆转，分明是暗示嘉靖，夏言可能毁损了他的手敕，火上烧油，但又不露痕迹！嘉靖听罢，果然大怒，不但手敕和银章一并追回，还“削言少师，着言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致仕”，就是说，让夏言退休了。夏言糊里糊涂之中被严嵩狠狠捅了一刀。

400多道工装裱的手敕全都缴回了。嘉靖帝看着这些，又想起了夏言的不少贡献，觉得自己不该将他撵出去，于是下诏“免了前旨”，追回夏言，并嘱咐他办事要注意，“以免众怨”。夏言以为是严嵩的功劳，反而去谢严嵩。严嵩见难遣走这个对手，正愁没办法，见夏言来，立即又心生一计，建议夏言向皇上说明“众怨”的缘故。严嵩知道嘉靖最反感辩解，那无疑是对圣旨的否定。果然，嘉靖“复不悦”，连连谴责夏言傲慢。严嵩又在背后挑动皇帝亲近的大臣郭勋和霍韬等攻击夏言，使皇帝觉得夏言“不荷众望”。第二年7月，便以奏章有错字为名，再次把夏言赶出内阁。严嵩的挑拨成功了。

可是，夏言出阁形成的空白别人无法填补。首先，夏言青词写得漂亮，无人能及。其次，北边鞑靼各部侵扰掳掠晋陕冀，军政要务混乱不堪，无人能理。皇帝亲览军务，不胜其烦。忧国忧民的夏言闻知，上《御边十四策》，皇帝又念起了他能干，重新启用他做首辅。这回夏言可知道了好人歹人，一上任就组织力量打击暗藏的对手。严嵩感到大祸临头了。

怎么办？生死决于毫发。严嵩几经思索，终于决定去找皇帝“解决问题”，而且想了一个毒计：利用谣言左右皇帝的意图，赶走夏言。

世宗最喜欢臣下顺从自己的心意，但是严嵩发现夏言有两件事做的令世宗很不开心——一是世宗命令阁臣们入宫时可以以马代步，这本来已经是一种优待了，但夏言不善骑马、总是坐着轿子进进出出，自己优待自己；二是皇上不喜欢旧式帽子，就命匠人制作了几顶香叶道冠，不仅自己戴在头上，还赏给那些善写青词的大臣们以示恩宠，但夏言觉得身为入臣头戴这种稀奇古怪的帽子有些不伦不类、所以不戴。两件事情都不称帝心，世宗嘴上虽未说，但严嵩早已猜到皇上心里去了。刚好严嵩也得了香叶道冠，他马上就戴上去见皇上——不仅是戴上，还精心加工、在上面又罩了一层薄纱以示爱惜。皇上见状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可找着了一个“知己”，就特意将严嵩留下谈天说地。言谈之间，严嵩忽然眼泪“夺眶而出”，忍不住抽泣起来。世宗大惊，不知道这老头儿好好的为什么这般伤心。细问之下，严嵩才抽抽噎噎、添油加醋地哭诉夏言“欺凌臣下，目无皇上”，把自己的遭遇完全同忠君联系起来。世宗大怒。痛斥了夏言。正好日食，严嵩串通礼部，说这是“臣下怠慢天子”，致使日失其光，嘉靖深然之，第三次将夏言赶出内阁，夏言罢去之后，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八月，严嵩终于如愿以偿地被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兼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直文渊阁。此时的严嵩，已经61岁了。

人往高处走，严嵩入阁之后的打算并不是做普通辅臣的一员、而是要做内阁的首辅。可惜初入阁门，他资历尚浅。夏言虽罢，还有早已入阁的翟奎，所以翟奎先以次序接掌了首辅之权。面对这种情况，严嵩不急不躁，再候良机。

严嵩首先要做的事情，仍是继续讨皇上喜欢。他入阁时虽已年过六十，但精神抖擞、不逊少壮。他主动辞去礼部尚书的职务，一头扎进内阁的值班室、每天都从早忙到晚，甚至创下几个月不回家梳头洗脸的历史记录。世宗对此大为惊叹，觉得从来都没有过如此勤勉的大臣，就专门赏赐给严嵩一枚文为“忠勤敏达”的银记、并加官太子太傅（从一品）

以示表扬；另外还亲自给严嵩家中的藏书楼和奉玄阁分别题名为“瑶翰流辉”、“延恩堂”以示恩宠。很快严嵩享受到的“圣”遇就比翟奎好的多了。“忠勤敏达”的同时，严嵩密切注意翟奎的举动，想寻找他的疏漏。在入阁的第二年，他终于揪住了翟奎的小辫子。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翟奎的两个儿子在会议中双双上榜。会议是中央级的科举考试，翟奎“二子登科”，自觉荣耀非常、喜不自禁。可是善于“思考”的严嵩却从翟家的这件大喜事中思考出了问题，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哪会那么容易就有一家会议中同时考中两个人的事情呢，说不定就是翟奎利用职权从中舞弊。翟奎正高兴的忘乎所以，忽然被泼了这么一盆子凉水，自然气急败坏。他马上上疏申辩并请求立即复试。孰不知严嵩等的就是翟奎这一招，因为翟奎被气昏了头容易忘事儿，严嵩的记性却很好——世宗早就规定了大臣被劾时不许上疏辩解，而应先自己好好反省、再听候圣裁。违反皇上规定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呢？果不出严嵩所料，世宗一见翟奎之疏就大发脾气，怒斥翟奎不候旨而辩，气头上就削了他的职。翟奎一滚蛋，这内阁首辅一职，舍严嵩其谁！

初任首辅的严嵩还是比较谨慎的。他本想独揽票拟之权，但随后入阁的吏部尚书许瓚和礼部尚书张璧却大为不满，许瓚还大发议论、指责严嵩“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严嵩见自己根基不稳，为防肘腋生变，就假意求皇上说：“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瓚、璧皆入”。成国公朱希忠和京山侯崔元是当时内阁之外最有权势的朝臣。

世宗早就一门心思“玄修”，根本懒得见那么多大臣，自然没有同意严嵩的要求，但心里却对严嵩的“无私”精神大为感动，这一激动就又加其官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结果严嵩通过这一他本来就料定不会被批准的请求，不仅讨了皇上的欢心、讨了同仁的欢心、讨了阁外重臣的欢心、衬托了夏言的独断专行、升了官加了俸、还堵住了以前以后说自己揽权的那些人的嘴——我本想同大家一起处理政事，但皇上只让我一个去听宣召，我怎么敢违抗圣旨呢？这一箭何止是一箭双雕！

有诗云“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其实得志猖狂在更大的程度上说是人的本性。严嵩原本一直夹紧尾巴是为了向上爬，爬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难免有些得意。他忍不住日渐骄横，引起了世宗的不满。同时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隐患，那就是夏言虽罢，但却并没有死。

罢相回家之后的夏言不甘心败落于严嵩之手。返乡之后，夏言苦思打动皇上以求官复原职的办法。最后决定由“青词”入手。夏言本来就“青词”起家，相对来说，其“青词”质量远非严嵩可比。下野之后，夏言一直坚持作“青词”以奉皇上，显示老臣耿耿之心。事实证明，这一招的确有效。

过了两年多，世宗突然又思念起夏言来，觉得还是由夏言来主政，功效会更好些。于是便派人捧敕前往夏言家中，尽复他一切官职，召来重新起用。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重任首辅，严嵩依例降为次辅。通过这件事，夏言对严嵩已经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他的为人十分轻贱，因而他这次回来，对待严嵩不但轻慢如故，而且处处加以打击。严嵩决定的事，往往予以全部推翻，严嵩所安插的私人，无不一一予以斥退。严嵩眼看着自己的心腹一个一个地被赶走，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他仍是笑语周旋，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窥视时机，准备报复。这次他打定主意，只把夏言赶出内阁还不行，还必须把他置之死地才可以保住自己。

时隔不久，夏言和曾铣共同筹划的议复河套的事件，给严嵩带来了机会。河套地区，三面凭河，土地肥沃，宜于农桑，而且接近明朝的榆林、宁夏、偏头关等边镇，对明朝的北



· 周 ·

部边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明朝建立后,蒙古族统治者北逃沙漠,但是仍有一定势力。到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蒙古族逐渐形成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三部势力此消彼长,或分或合,不过他们都接受明朝的封号官职,称臣纳贡,互市贸易。但同时又不断南下侵扰北部边境,掳掠人口、粮食等财物,并且有复辟元朝的企图。所以整个明代,北部边患不绝。明中叶以后,河套地区成为蒙古军事割据势力向内地发动进攻的一个重要基地。明朝初期,政府在河套外围地区建立起坚固的防线,但自永乐以后,就逐渐放弃前沿防线而在河套内线驻防军队,以致造成北京紧邻前线,内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明政府只好重建防线,据险筑城,形成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陕西、甘肃等九镇(又称九边)。蒙古军事势力进驻河套始于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以此为基地,不断骚扰内地。“套寇”于是成为明朝心腹之害。讨论收复河套,在嘉靖中期成为朝廷的大事之一。这时的三边总督是曾铣。曾铣是嘉靖八年进士,他勇武而又机智,忠于职守,立志扭转败局,安定边陲。面对蒙古势力占据河套内外,他力主收复失地,反对消极防守。当时内阁首辅是复官后的夏言,他也极力支持曾铣收复河套、统一故疆的建议。而此时的嘉靖皇帝觉得,靠他的“祷玄之功”,玉帝神仙会帮助他保民伐逆,因此他对收复河套似乎也有了信心,批准了夏言的奏请。严嵩对收复河套这样重大的事情,总是阳奉阴违。讨论的时候,他表面上附会夏言,称赞曾铣,暗地里却构置陷阱,制造杀机,置国家边防安危于不顾,阴谋借此事陷害曾铣,从而达到攻倒曾铣的支持者夏言的险恶目的。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陕西西安府麻陂山山崩,按照迷信讲,这是“分崩离析”的征兆。严嵩心想,皇帝迷信神仙玉帝,只要把山崩与“复套”之事联系在一起,就一定能够打动圣心,不怕曾铣、夏言人头不落地。于是他指使有关官员暂时将这一灾变隐匿不报,以待时机成熟时再禀奏皇帝。12月,嘉靖皇帝命兵部进呈收复河套的具体方案。恰巧,北京城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这又是一个不祥之兆。经占卜,说是边境有警的征兆。机会来了,如果这时再让皇帝知道山崩的灾变,一定能够大大增加嘉靖皇帝的忧虑,从而产生对夏言、曾铣力主收复河套的反感。于是这个月的28日,把迟报半年之久的关于山崩的奏章送到皇帝面前,这时皇帝正在举行祈祷长生的醮斋,二份凶报一齐奏到,令他既生气又害怕。原来这也是严嵩作的手脚,他早已买通了皇帝身边的太监,嘱咐他们专等皇帝醮斋祈祷时,再把有关曾铣议复河套的奏章以及灾异报告一起进呈给他批阅,以引起皇帝的反感。严嵩又秘密授意皇帝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在皇帝面前谄言夏言,说山崩凶兆应当在皇帝身上兑现,但可以挽回,只须由宰相和边防人将当替身,便可以化险为夷,皇帝仍可万寿无疆。严嵩又偷偷地对皇帝宠信的太监说:汉朝灾异发生时,赐予三云死罪,就可以应付天灾。平日里就经常得到严嵩贿赂的太监,自然听从严嵩的安排,所以当皇帝问太监收复河套之事能否成功时,他们就谈危险,不能成功。于是在第二年初春,收复河套形势急转直下,嘉靖皇帝一夜之间变脸,下令纠治曾铣欺君误国之罪。认为师出无名,又无兵力、财力,完全是肆意屠杀百姓,欺君邀功之举。严嵩抓住时机,大肆攻击曾铣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并把矛头指向夏言,几次上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荒谬地认为北部边疆深重的灾难并不是由蒙古势力的侵扰造成,而是由抗战官军的抵抗造成的。因此解决虏事的出路不是打退进犯,制止战争,而是任其抢掠烧杀,让他们满载而去。他还及时“提醒”皇帝说,收复河套虽然是曾铣提出的建议,但是得到首辅夏言的全力支持并予以批准。严嵩还以退为进,说当时自己没有极力阻止,也有过失,请求辞职,以讨好皇帝。严嵩变色龙的嘴脸,虚伪、狡诈、阴险的丑态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不过这一

· 易 ·

五六三